

《孙子兵法》成书年代补说

吴春生, 武振玉

(吉林大学文学院, 吉林长春, 130012)

摘要: 词的演变和消失, 新词的产生, 是语言词汇变动的两个重要方面。一些词或短语, 如“克/能”“及……战/与……战”“士卒/士人”“疾/病”“于/於/在”以及“不得不”“会战”等, 它们的使用呈现出历时的阶段性特征, 根据这些特征所分别对应的时代以及这些词(短语)在《孙子兵法》和先秦其他文献中的出现情况推断, 《孙子兵法》主体部分成书应不早于战国中期、不晚于战国末年, 最迟不晚于西汉初期。

关键词: 词汇; 《孙子兵法》; 成书时代

中图分类号: H03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3104(2015)03-0255-07

关于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年代, 历代论者较多, 意见不一。归纳起来, 主要有春秋和战国两种说法。其中战国说又可分为春秋末至战国初说、战国中期说和基本完成于战国、定型于秦汉说等三种。李零先生指出, 要解决这些分歧, 主要靠对原书内容作具体研究。这包括两个方面, 一个方面是对书中字句所反映的时代性的研究, 另一个方面是对全书内容的综合研究, 例如研究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所见战争生活和军事制度的特点、《孙子》的军事思想体系, 等等。^[1]但就目前来看, 前人多从后一方面, 即《孙子兵法》中的思想体系出发来论其成书, 或把《孙子兵法》与其他典籍进行内容或文句的比较, 来确定先后顺序, 而从书中语言字句着手来研究其成书时代的, 较为少见。而恰恰从语言角度入手, 往往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, 为其成书时代提供有力的证据, 收到较好的效果。因为一方面, 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人, 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其所处时代的语言影响; 另一方面, “那些古书的伪造者未必是, 也难以是汉语史专家, 精通每一词、每一词义、每一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, 能够选择恰合于所伪时代的语言, 避免产生在那所伪时代以后的语言。”^[2]因而, 笔者以为, 只要能抓住作品语言所反映的时代特征, 就能够大致确定其成书年代。

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, 词汇(短语)对时代发生变化的反应远较语音、语法灵敏, 发展变动也最快, “词的演变和消失, 新词的产生, 是语言词汇变动的两个重要方面”^[3]。因此, 笔者拟从词汇入手, 通过一些常见词语(短语)的演变发展轨迹^①, 来为《孙子兵法》

的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作一补证。

一、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代上限

(一) 士人/士卒

“士人”一词, 在春秋及战国初期文献中未见一例, 而在战国中晚期及以后的相关文献中却屡屡出现, 如:

(1) 所谓恤孤者, 凡国都皆有掌孤, 士人死, 子孤幼, 无父母所养, 不能自生者, 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, 养一孤者, 一子无征。养二孤者, 二子无征。养三孤者, 尽家无征。(《管子·入国》)^②

(2) 所谓问病者, 凡国都皆有掌病, 士人有病者, 掌病以上令问之。(同上)

(3) 士人闻之曰: “蛙有气, 王犹为式, 况士人之有勇者乎!” (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)

(4) 孔子曰: “人有五仪, 有庸人、有士人、有君子、有贤人、有圣人, 审此五者, 则治道毕矣。”……公曰: “何谓士人?” 孔子曰: “所谓士人者, 心有所定, 计有所守, 虽不能尽道术之本, 必有率也; 虽不能备百善之美, 必有处也。是故知不务多, 必审其所知; 言不务多, 必审其所谓; 行不务多, 必审其所由。智既知之, 言既道之, 行既由之, 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, 贫贱不足以损。此则士人也。” (《孔子家语·相鲁》)

(5) 古人曰: “无蒙冲而攻, 无渠答而守。”是谓

收稿日期: 2014-11-10; 修回日期: 2015-03-20

作者简介: 吴春生(1973-), 男, 安徽宿州人, 文学博士, 吉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, 主要研究方向: 古代汉语; 武振玉(1963-), 女, 辽宁新宾人, 历史学博士,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研究方向: 汉语史, 古文字学(金文)

无善之军。视不见，听无闻，由国无市也。夫市也者，百货之官也，市贱卖贵，以限士人。(《尉繚子·武议》)

但此5例“士人”没有明显证据与军队有关，与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“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”中与军队相关的“士人”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。两汉时期才见到与军队有关的“士人”用例，如：

(6) 莽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，号曰“九虎”，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……莽愈爱之，赐九虎士人四千金。(《汉书·王莽列传》)

(7) 令军士人持二升糒，一半冰，期至遮虏鄣者相待。(《汉书·李陵列传》)

(8) 太后不听，曰：“中官统领禁省，自古及今，汉家故事，不可废也。且先帝新弃天下，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？”(《后汉书·窦武何进列传》)

笔者之所以认为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中的“士人”以及此三例的“士人”与军队有关，是因为上下文中有与军队有关的相关表述，例(6)中有“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”，例(7)“士人”前有“军”字，例(8)有“统领禁省”。而笔者之所以认为战国晚期的几例“士人”与军队无关，是因为下文中找不到类似的与“军”有关的文字。由此笔者认为，仅就“士人”本身而言，无论战国晚期还是两汉时期，“士人”所指向的对象是同一的，既可偏指“士”(仅指有一定地位或一定技术专长的人)，也可偏指“人”(泛指一定范围内的人)。至于其是否和军队相关，并不是其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因为语境有没有和军队相关，若其用在和军队相关的语境中，则既可指军队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，又可指军队范围内的全部将士。这一点回到《孙子兵法》中也可以得到证明。本书中在表述兵士时，用“士人”的仅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一处，主要还是以“士卒”为主，如：

(9) 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(《始计》)

(10) 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涕沾襟，偃卧者涕交颐，投之无所往，诸、刳之勇也。(《九地》)

(11) 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，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(《九地》)

这几例的“士卒”显然属于地位低下的普通士兵。战争的胜利仅士卒们的英勇还不够，还需要全军上下一心，官兵同仇敌忾，因而作者表达必胜的信念时，用了“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”，而没有用“士卒尽力”，因为“士人”不仅能指称普通士兵，还能指称军队中包括将领在内的管理人员，而“士卒”却不能。据此，笔者认为战国中晚期的“士人”与《孙子兵法》中的“士人”以及两汉时期的“士人”具有同一性。

再看“士卒”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有云：“缮甲兵，具卒乘。”杜预注：“步曰卒，车曰乘。”《吕氏春秋·简选》有云：“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，锐卒千人，先以接敌，诸侯莫之能难，反郑之埤，东卫之亩，尊天子于衡雍。”高诱注曰：“在车曰士，步曰卒。”在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中，“卒”字下辨“兵、士、卒”云：“士，是战斗时在战车上的战士。”这也就是说“士”和“卒”本身即有兵士之义，如：

(12) 下军之士多从之。(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)

(13) 遂疾进师，车驰卒奔。(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)

但同时“士”又有男子、贵族、读书人等其他多种义项，客观上就有双音化以达到互相区别的要求，因而继《穀梁传·僖公元年》中“子友谓莒掾曰：‘吾二人不相说，士卒何罪’”句之后，在战国中晚期，“士卒”开始较多出现，如：

(14) 代王闻之，大恐，则将其士卒葆于代谷之上，离枝遂侵其北，王即将其士卒愿以下齐。(《管子·轻重》)

(15) 是以拔千丈之都，败十万之众，死伤者军之乘，甲兵折挫，士卒死伤，而贺战胜得地者，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。(《韩非子·八说》)

(16) 遽使奚施归告，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，曰：“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。大国不至，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，日无所与焉，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。何其久也，使人臣犒劳以璧，膳以十二牛。”(《吕氏春秋·悔过》)

表1列出了先秦几部典籍中“士人”和“士卒”的用例数字。

(二) 克/能

作为可能类助动词，“克”和“能”意义大致相近。^⑨历代注家也多用“能”来训“克”，如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云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郑玄笺曰：“克，能也。”《尚书·尧典》云：“允公克让，光被四表。”孔安国传曰：“克，能也。”《孙子兵法》中未见助动词“克”的用例，助动词“能”共见46例，如：

(17) 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(《谋攻》)

(18)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於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(《军形》)

两例中“能”均为助动词。“克”与“能”义虽近，但二者在使用上存在着历时的时段性。据刘利先生考察，这种时段性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前段——西周金文、《尚书》。此段明显可见的是，“克”与“能”并存，而用“克”多于用“能”。

中段——《国语》《左传》。此时,“克”虽然仍有少量用例,但“能”的用例数量绝对超过了“克”。这表明“克”已经趋于衰亡。这可以视为“能”替代“克”的过渡阶段。

后段——《墨子》《孟子》以下。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大多只用“能”,“克”极少使用或绝对不用。这可以看作“能”替代“克”的完成阶段。^[4]

表2列出了刘利先生对各阶段主要典籍及笔者对《管子》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克”“能”的用例统计数字。

(三) 树(动词)/树(名词)

金文的“树”字像以手植树,所以“树”的本义当为“植树”“种植”。在先秦,“树”有动词“树立”“种植”和名词“树木”三个义项。“种植”义如《诗经·郑风·将仲子》云:“无折我树桑。”“树立”义如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:“树德莫如滋,去疾莫如尽。”“树木”义如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:“既享,宴于季氏。有嘉树焉,宣子誉之。”

《孙子兵法》中有“树”2例,如下:

(19) 绝斥泽,惟亟去勿留,若交军於斥泽之中,必依水草,而背众树,此处斥泽之军也。(《孙子·行军》)

(20) 众树动者,来也。众草多障者,疑也。(《孙子·行军》)

两例中“树”均为“树木”义。

郭锡良先生在谈词类活用时,曾统计过先秦几部典籍中“树”作为动词和名词的用例数^[5],艾贵金先生对先秦典籍中的“树”也做过调查。^[6]结合他们的调查数据,并加上《孙子兵法》中的两例,可列表3

如下。

从表3可见,与“克/能”相同,“树”的动词和名词义项也呈现着明显的历时性。春秋和战国初期,“树”主要为动词义项,到了战国中期以后,才逐渐有了名词“树木”的义项。

(四) “及……战”/“与……战”

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对“及”字的解释有二:一是“追上”“赶上”,二是“与”。在“与”字义项下,举出了《左传·桓公元年》的例子“夏四月丁未,公及郑伯盟于越”作为书证。^[7]这说明“及”和“与”基本等义。

涉及“及”的“N1+及+N2+战”组合式,表示N1和N2为交战的双方,如:

(21) 夏,四月,丙戌。卫孙良夫帅师,及齐师战于新筑。(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)

(22) 十有一月,壬戌,晋侯及秦伯战于韩。(《穀梁传·僖公十五年》)

和“N1+及+N2+战(斗)”类似,“N1+与+N2+战(斗)”也表示N1和N2为交战的双方,如:

(23) 七月,戊戌,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。(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)

(24) 人之民恶我甚,则日欲与我斗。(《荀子·王制》)

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及……战”未见用例,“与……战”有以下两例:

(25) 故我欲战,敌虽高垒深沟,不得不与我战者,攻其所必救也。(《虚实》)

(26) 我不欲战,虽画地而守之,敌不得与我战者,

表1 先秦典籍中“士人/士卒”用例统计表

	公羊传	左传	穀梁传	管子	孙子兵法	韩非子	孔子家语	吕氏春秋
士人	0	0	0	2	1	2	5	0
士卒	0	0	1	5	4	10	1	3

表2 “克/能”用例统计表

	西周金文	今文尚书	国语	墨子	孟子	孙子兵法	管子	韩非子
克(助动词)	5	68	12	0	0	0	0	0
能	2	25	272	4	115	46	608	484
用例比	2.5:1	2.9:1	1:21					

表3 “树(动词)/树(名词)”用例统计表

	尚书	毛诗	左传	孟子	墨子	孙子兵法	荀子	韩非子
树(动词)	4	10	15	7	17	0	5	25
树(名词“树木”)	0	0	3	1	6	2	6	5

乖其所之也。(《虚实》)

据观察,和前几组相类似,在先秦,“及……战(斗)”和“与……战(斗)”的组合式呈现出历时的阶段性特征。表4列出了包括《孙子兵法》在内的两者用例统计。

表4 “及……战/与……战”用例统计表

	公羊传	穀梁传	左传	管子	孙子兵法	韩非子	荀子
及……战	14	16	26	0	0	0 ^④	0
与……战	3	4	13	1	2	11	3
比例	4.6:1	4:1	2:1				

从表4中可见,“及……战”到战国中期逐渐在文献中消失,而“与……战”却保留并一直使用了下来。

(五) 其他短语——不得不、会战

“不得不”是助动词“得”的双重否定形式,“会战”是动词“会”与动词“战”的组合,《孙子兵法》中各见1例,如下:

(27) 故我欲战,敌虽高垒深沟,不得不与我战者,攻其所必救也;我不欲战,虽画地而守之,敌不得与我战者,乖其所之也。(《虚实》)

(28) 故知战之地,知战之日,则可千里而会战。(《虚实》)

检先秦文献可知,“不得不”“会战”在战国中期以前均未有见到用例。因此根据这两个新起组合短语的出现时代,也可以进一步证明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时代的上限大约是在战国中期。

(六) 小结

上述五组词汇(短语)中,第一组“士人/士卒”与最后一组“不得不”“会战”是战国中期及以后新出现的词,对它们来说,其新出现的时代——战国中期,便是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代的上限;对于中间三组词汇来说,当语言中存在着两个词——A词和B词都表示同一意义,或者语言中某个词有两个不同的义项——A义项和B义项都表示同一个词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只见到B词或某词的B义项,没有见到A词或某词的A义项,那么A词或A义项什么时代开始萎缩,并有被B词或B义项取代的趋势,那么这个时代就可以确定为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代的上限。^[6]

就“克/能”来说,“克”作为助动词在战国前期及以前大量使用,战国中期以后被“能”所替换,“克”鲜见用例,《孙子兵法》中有“能”而无“克”。就“树”来说,“树”在春秋和战国初期,主要用为动词,到了战国中期以后,才逐渐用为名词“树木”,《孙子兵法》

中有其名词,而无动词。就“及……战/与……战”来说,“及……战”到战国中期逐渐在文献中消失,而“与……战”逐渐接替了“及……战”,《孙子兵法》中未见“及……战”,而见“与……战”。根据以上五组词汇(短语)的分析,笔者认为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时代上限当定为战国中期。

二、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代下限

(一) 疾/病

“疾”与“病”虽有程度之别,但总体上来看二者是一对同义词。二者都可做名词“疾病”,也都可做动词“生病”。这两个义项在战国中期以前主要用“疾”来表示,战国中期以后,“病”的用例逐渐增多。王彤伟先生统计了先秦及西汉主要文献中的用作“疾病”“生病”义的“疾”和“病”字用例数,如下:

《诗经》中“疾”5例,“病”0例;

《仪礼》中“疾”3例,“病”1例;

《左传》中“疾”144例,“病”16例;

《公羊传》中“疾”16例,“病”5例;

《论语》中“疾”12例,“病”4例;

《孟子》中“疾”13例,“病”8例;

《墨子》中“疾”27例,“病”18例;

《韩非子》中“疾”11例,“病”40例;

《吕氏春秋》中“疾”39例,“病”23例;

《淮南子》中“疾”25例,“病”36例;

《史记》中“疾”112例,“病”531例。^[8]

从上述统计可见,伴随着时代的推进,“病”的用例数在逐渐增多。到了战国末期及西汉时代,“病”的用例数已经大大超过了“疾”,其组合能力也在不断增强。与之相应,“疾”的用例数已经远远小于“病”,其组合能力也在不断下降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中只见到“疾病”义的“疾”1例,如下:

(30) 凡军好高而恶下,贵阳而贱阴,养生而处实,军无百疾,是谓必胜。(《孙子兵法·行军》)

把王彤伟先生的统计数字和《孙子兵法》中的1例列入表5。

(二) 盈/满

《说文·皿部》有云:“盈,满器也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又云:“满,盈溢也。”可见二者都有“充满”之义。《孙子兵法》中未见“满”字用例,“盈”字有3见,如下:

(四) 小结

当语言中存在着两个词——A词和B词都表示同一意义,或者有两个不同的义项——A义项和B义项都表示同一个词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只见到A词或某词的A义项,没有见到B词或某词的B义项,那么B词或B义项什么时代开始增多,并有取代A词或A义项的趋势,那么这个时代就可以确定为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代的下限。^[6]

就“疾/病”来说,战国中期以前,“疾”的用例较多,到了战国末期及西汉时代,“病”的用例数已经大大超过了“疾”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只有“疾”字用例,没有“病”字用例。就“盈/满”来说,战国中晚期之前,表示“充满”义主要用“盈”,从战国中晚期开始,“满”逐渐取代了“盈”。《孙子兵法》中未见“满”字用例,只有“盈”字用例。就“于/於/在”来说,情况稍显复杂——“于/於”能帮助确定上限,“於/在”能帮助确定下限。先来说帮助确定下限的“於/在”。战国末期、西汉初期时,“在”开始虚化为介词,文献中介词“在”使用比例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。《孙子兵法》中未见到介词“在”的用例。基于三组词在《孙子兵法》中的使用情况,笔者认为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下限只能为战国末期、西汉初期。

至于能帮助确定上限的“于/於”,春秋时期,“于”和“於”混用;春秋晚期、战国初期时,“於”字使用比例呈现出随着时代的推进逐渐增多的趋势。到了战国末期、西汉初期,基本上取代了“于”字。《孙子兵法》中未见“于”字,只见“於”字,所以从“于/於”推出的上限可能为战国初期。但这与我们要推出的成书时代的结论并不矛盾,因为无论是上限还是下限,其目的都是为锁定成书时代服务,如果用坐标轴来表示的话,这一点会更清楚,见图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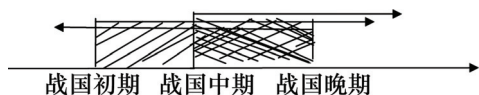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代示意图

尽管上限有战国初和战国中期两种,但只有图中双层阴影部分所指示的时代才能为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时代。

三、结语

综上所述,结合《孙子兵法》中出现的春秋、战

国乃至西汉时期的词汇(短语)来看,正如徐刚先生(2008)所指出的那样,“经文都应该有一个不断加工完善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,难免加入更晚时候的东西。”^[11]笔者认为,《孙子兵法》虽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,而是经过数代人的增益修改,但是其主体部分成书大约应不早于战国中期,不晚于战国末年,最迟不晚于西汉初期。不过,正如郭化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,“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,很难断定《孙子》成书的确切年月。”^[12]同时由于笔者所选词汇组数较少——不足十组,考察的同时也没有结合考古的新发现,所以笔者的结论也许只能是从语言学角度对《孙子兵法》成书过程所做的一种推测。

注释:

- ① 李锐(2008)指出,“汉语词汇的发展、变化,应该是一个较长期的历史过程。汉语史的方法,应该是用于考察长时段内词汇变化的工具;不宜用来考察短时段,尤其是想凭借它在战国中晚期之间作出‘一刀切’式的分别。”参见李锐:《“重文”分析法评析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8(1)。
- ② 《管子》一书,冯友兰认为“就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”。李学勤(1992)也认为“把‘管子轻重’定为战国末世《管子》一系学者的著作最为恰当。”巩曰国(2004)亦支持上述看法。可参见冯友兰: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(上),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499页;李学勤:《〈管子·轻重〉篇的年代和思想》,载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2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;巩曰国:《〈管子〉成书与流传研究》,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4年。
- ③ 刘利先生通过调查得出“能”与“克”存在着用法上的区别和分工,但两者的区别不是本文中我们要讨论的重点。可参见刘利:《先秦汉语助动词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132页。
- ④ 《韩非子》中有一例“及与秦人战”,可视为与代替“及”的中间用例。由于跟在“秦人”前的是“与”,故列表时,归入“与……战”之列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李零. 孙子古本研究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2: 215.
- [2] 杨伯峻.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——《列子》著述年代考[C]// 杨伯峻学术论文集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4: 143.
- [3] 高名凯, 石安石. 语言学概论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: 131.
- [4] 刘利. 先秦汉语助动词[M]. 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0: 123.
- [5] 郭锡良. 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谈[C]// 汉语史论集(增补本)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5: 49.
- [6] 艾贵金. 从汉语史的角度论证《素问》成书年代的下限[D]. 武汉: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 2004.

- [7] 王力, 唐作藩, 郭锡良, 等. 王力古汉语字典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0: 99.
- [8] 王彤伟. 《史记》同义常用词先秦两汉演变浅探[D].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 2004.
- [9] 郭锡良. 介词“于”的起源和发展[C]// 汉语史论集(增补本)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5: 226-230.
- [10] 王其和. 论《史记》中的“于”和“於”[J].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, 2008(5): 35-39.
- [11] 徐刚. 古文源流考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: 47.
- [12] 郭化若. 孙子兵法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4: 412.

Lexical evidence for dating *The Art of War*

WU Chunsheng, WU Zhenyu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Jilin University, Changchun 130012, China)

Abstract: The evolu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words,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words,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to judge vocabulary change. The use of the words or phrases such as “*ke* (克)/ *neng*(能)”, “*shu*(树)/*mu*(木)”, “*ji...zhan* (及……战)/*yu...zhan*(与……战)”, “*shizu*(士卒)/*shiren*(士人)” “*ji*(疾)/*beng*(病)” “*yu*(于)/*yu*(於)/*zai*(在)” “*budebu*(不得不)” “*huizhan*(会战)” and so on, presents a diachronic stage characteristics.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hases of corresponding times and the words or phrases which appeared in *The Art of War* and the other literature, *The Art of War* was written no later than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.

Key Words: vocabulary; *The Art of War*; the year the book was written

[编辑: 胡兴华]